

# 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

## ——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内容提要** 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总统虽位居元首,但只是“虚位”。蒋介石追求实际权力,对“虚位”不感兴趣,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参选总统,自己改任参谋总长或行政院长,从而改变政府形象,赢取美国好感,以利于争取美援。蒋的提议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反对,以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总统权力,蒋介石遂接受提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此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政权仍然是“独裁的政权”,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

**关键词** 蒋介石 胡适 司徒雷登 总统竞选

194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蒋介石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长期追求权力,他为何在此时有此考虑?关于此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说:“不管这是否是计划好的,蒋委员长这一行动是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此言有无道理?

### 一、李宗仁第一个建议胡适竞选总统

第一个建议胡适参加竞选总统的是李宗仁。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由于李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也由于他对学生运动采取柔性政策,注意联系教育界人士,被认为作风开明,有一定社会声誉。国民党决定于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后,李积极准备参加竞选副总统。其想法是“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他曾对黄绍竑说:“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做敢为

---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59页。

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1948年1月,李宗仁率先成立竞选办事处,并于8日在北平召开外籍记者招待会。他托白崇禧、吴忠信转报蒋介石,又亲自致函,表示愿“追随钧座,勉效驰驱”。

1月11日晨,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致函李宗仁,鼓励他参加竞选,函中引用自己早年所作《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称:

第一虽只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13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题为《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其中提到胡适的名字。14日,李宗仁复函胡适,告以《新生报》所登通讯,并说:

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体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胡适收到此信后,只将有关报纸剪存,并未动心。

在南京的蒋介石15日就得知北平李、胡之间的通信。当日日记云:“李宗仁自动竞选副总统而要求胡适竞选大总统,其用心可知,但余反因此而自慰,引为无上之佳音。只要能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务使我人民与部下皆能安心服务,勿为共匪乘机扩大叛乱则幸矣。”17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桂系携贰益显”,“皆足顾虑”。

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竞选一事的最初记载。

李宗仁是桂系领袖,和蒋介石有矛盾。1927年至1936年之间,李宗仁曾多次领导或参加反蒋军事行动。抗战期间,为团结抗日,蒋桂矛盾缓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李宗仁到北平,掌控北部中国,蒋、李之间尚无直接冲突,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声望日降,而李宗仁声望日升。还在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就曾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北平情况:“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不忠于国民政府的谣言。”1948年1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宗仁又着力宣扬自己受到各地人民的拥护。他说:

余为华南人,珠江流域人民无疑将为余之支持者。北伐后,余曾驻防武汉,当给长江流域

《李宗仁回忆录》下,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873、875—876页。

《李宗仁致蒋介石》,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000000414A。不过,蒋在2月23日以后才读到此函。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1月15日,台湾远流公司1990年影印版。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1月15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均同。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99—300页。

人民以良好印象。抗战时余曾在徐州作战,胜利后复来华北,故与黄河流域人民亦有深切之关系。此次宁夏马主席过平,亦允加以支持,且支持余者将包括各阶层。如去岁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学潮,北平幸未发生不幸事件,皆因余持客观态度,相信学生本意本好,故学生对余之印象亦甚良好。

关于政治主张,李并未多说,仅称:“中国自身亦可逐渐解决其问题,并非必须美援,假如有美援,问题可解决较快耳!中国愿与美保持传统友谊。中苏国境毗连,亦望能维持友好关系。”这种政见,也与蒋介石当时的亲美反苏主张不同。

历史积怨,加上李宗仁“自动”参选等种种情况,引起蒋介石的警惕,怀疑其“用心”,并进一步怀疑桂系“携贰”。

## 二、军统的两封情报促使蒋介石思考本人竞选总统问题

就在李宗仁建议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之际,军统送呈的两封电报促使蒋介石就此问题作进一步思考。

一封情报是军统局次长郑介民的报告。该报告称:1月13日晨,《大公报》的胡霖通过电话请求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司徒雷登当即邀胡于当日中午至大使馆午餐。午餐时,胡霖自称代表上海文化教育界、银行界、商界,约60余人建议:“值兹全盘混乱,局势动荡之时,同人等不愿共产党成功,但因目睹政府环境恶劣,拟请蒋主席下野,以六个月为期,在此期内,政府由张岳军负责支撑,未识大使意见如何?司徒雷登答称:“此事须本人请示美国政府,并将此项意见用书面写出,俾作根据。至本人私人意见,蒋主席断不能下野,下野则全国必混乱不可收拾。谈话时,傅泾波在座。14日,傅将谈话情况面告郑介民。郑即将有关情况向蒋汇报。

这一封情报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是:胡霖等上海人士对蒋不满,正在争取美国人的支持,要求蒋“下野”。对此,蒋介石极为愤恨。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霖“本阴险政客,万不料其卑劣无耻至此,是诚洋奴成性,不知国家为何物!”由此,他进一步指责一般知识分子和名流严重丧失“民族自信心”,“均以洋人为神圣,国事皆以外国态度为转移”。不过,他并不准备妥协,日记云:“若不积极奋斗,何以保种与立国也!对于此种阴谋,惟有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视之!”19日晚,蒋介石思前想后,不能成眠。第2天,蒋继续思考,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是“告洋状”,其目的在于“急欲推倒中央政府以为其自保地步”,进而想到文武官吏普遍悲观、消沉,没有人相信他的必可“平定匪乱”的保证,因而在日记中愤愤地写下了“殊为可痛”4字。

另一封情报是1月13日军统上海站的密函。该函称:美政府有力人士正酝酿一项希望蒋介石“让位”的运动,其理由为:1.蒋介石本有三张牌,即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孔下,宋上;宋下,张上。现在三张牌均已出尽,但“政府之贪污无能,更有加无已”,“故中国今后如不有改辕易辙、大事更张之办法,实难有改进复兴之望”。2.蒋介石主政20年,“思想陈旧、性复固执,且极易受人之包围,不能发挥有效之力量”,“故中国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责任,实应由蒋主席负之”。密报认为:此项

《李宗仁准备竞选副总统》,《申报》,1948年1月9日,第1张第1版。

《情报》,1948年1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0506。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19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20日。

运动的主导者是美国的马歇尔和中国的政学系首要。马之所以主张去蒋,原因在于中共“绝不妥协”和蒋本人固执守旧,致使调停不成,怀恨在心。政学系则有干部在美活动。王世杰、张君勱等对蒋均有较多批评。冯玉祥则劝告美国政府,“不可以军械援助中国现政府,否则徒为共党间接致送武器,必须俟中国政府首脑部整个改组后,始可授以军械”。密报提出,冯玉祥的背后是马歇尔。

这一封情报向蒋介石传达的信息是:美国人对蒋介石严重不满,准备“换马”。这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严重的刺激,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出,拟作“让贤选能的准备,在国民大会召开时,本人不加入竞选,“交出政权”,推出国内“无党派名流”为“大总统”,自己暂任参谋总长,以协助继任者。这一则《反省录》显然是在得知美国准备“换马”之后的对策。他准备让出总统名位,改任参谋总长,以便牢牢掌握所有国家权力中最重要权力——军权,继续指挥“剿共”。

蒋介石早已深知美国人对他的不满,也十分担心美国人“换马”。1947年8月24日,魏德迈结束访华,在南京发表声明,声称中国的复兴工作,“正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蒋介石非常紧张,曾向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探询,美国是否“有意迫其退休或改职”。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察美国形态,其政策已以我为其对象,志在先倒我而后达其统治中国之目的。如美国果有此政策,不仅为远东之害,而且为美国之祸。余惟有自力更生,不偏不倚中以求独立与自强。他日果能如此,未始非美国今日侮华卑劣政策之所赐也。”可以看出,当时蒋还自觉有力量,以“不偏不倚”和“独立与自强”自励,然而时隔数月,形势变化,蒋介石威望日低,而不得不改变策略,准备进一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 三、在庐山休息期间决策

尽管蒋介石认为胡霖等人的行为“不值一笑”,然而事实上,却不能不重视。2月10日为农历戊子年除夕,蒋介石和宋美龄于8日相偕赴庐山休息。除夕这一天,蒋介石“勉效少年度岁之乐”,于宴会后放花、放鞭炮,让宋美龄一时很高兴。但是,更多时间,蒋介石夫妇高兴不起来。

在蒋介石夫妇上庐山之前,上海接连发生同济大学学生围打市长吴国桢、舞女千人捣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申新纱厂工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使蒋介石痛感“事业日艰,经济困窘,社会不安”,尤其使他揪心的是百姓和干部“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上庐山之后,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巨大困难又摆到了他面前。

2月18日,蒋介石接到顾维钧和新近赴美的中国技术团团团长贝祖诒的电报,得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向国会提交5.7亿美元的经济援华法案,其中5.1亿美元用于购运必需物资,减轻日趋严重的经济形势,其余6千万美元用于恢复运输、燃料、电力及输出工业。19日,司徒雷登为此发表声

《情报》,1948年1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0506。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17日。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02、303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7年8月25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10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1、3日。

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自印本,总第3392页。

明(《告中国人民书》),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国民党的统治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如“把他们政党和他们个人利益置于受难人民的利益之上”,“对于他们的党抱着非常狂妄的忠诚,绝不容忍其他一切的政治信仰,他们所用的方法非常残忍”,并且含蓄地批评国民党的“极权制度”,“有独立思考的人,不是屈服于思想统制,就是被迅速清除”。声明特别表示:“人民必需不断地使用开明舆论的力量,影响政府的举措,以防止官吏的滥用职权。因此,这就需要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接触客观报道的新闻自由。在极权制度下,这些自由便不容存在。”司徒雷登这篇声明所包含的对国民党统治的尖锐批评使蒋介石如芒在背。20日,蒋介石日记云:“闻美大使司徒昨日因其援华借款提出国会而又发表其侮华、背理、荒唐之宣言,可痛极矣。”

然而,使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不止于此。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审议援华法案,国务卿马歇尔出席作证,说明中国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政府急需援助,但如稳定货币,需要巨额基金,“在战争消耗和内部分裂的当前情况下,这种巨额的基金,多半是要浪费掉的”,因此,美国的援华方案“不应含有对于中国日后经济的实际保证”,“美国在行动上不当置身于对中国政府的举措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事务直接负责的地位”。下午,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他再次表示:“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已注定不是一个有力的盟友了。”对于马歇尔的这些言论,蒋介石自然强烈不满。

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接连失败,使蒋介石极度焦虑不安。2月1日,蒋介石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为总司令。2月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辽阳;19日,再克鞍山。蒋介石感到财力拮据,兵力不足,连子弹都极感匮乏。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虽然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更需要的是美国的军事,特别是军火援助。周以德等美国国会议员主张以援助军火为急务,但是马歇尔不同意,要蒋介石用外汇购买,他在证词中声称:

中国为要供应这些额外的外汇需要,可以利用其本国的某些财政资源……而最后,于必要时,尚可利用中国所持有的黄金和外汇。按1948年1月1日的估计,两项共值两亿七千四百万美元。中国人若能增益其外汇纯收入,此项总额即可随之增加。

外汇为稳定国内货币,向外采购所必需,蒋介石一向非常珍惜。抗战期间孔祥熙主管财政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外汇。宋子文接任后,为平抑物价曾大量抛售,消耗殆尽。蒋介石发现后,紧急刹车,但事后仍常常为此痛心疾首。现在,马歇尔却要蒋介石使用所剩外汇向美国购买军火,蒋自然极为恼火。2月2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接阅马歇尔复其司徒大使电意,对我接济军械之要求,仍以官话搪塞,毫无同情之心,对我东北危急之状况亦置若罔闻。观其答复议会对其援华不足之质问,乃推托于我政治、军事之无能实效。议会督促其军事援华,而彼以现款购械,必欲将我所余三亿美金之残款外汇完全用罄而后乃快其心。”由此,蒋介石大发对美国和马歇尔个人的一腔怨愤。他说:

美国外交不讲信义,无视责任,欺弱侮贫如此,其与今日之俄国,往日之德、日,究有何分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10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08页。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1948年2月20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4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08—1009页。

别？然此惟马之一人作梗，而与其整个国家平时之精神实相背矛。马歇尔实为其国家之反动最烈之军阀。若不速败，其将贻害其美国前途无穷也。

在《上星期反省录》中，他进一步批评司徒雷登的《告中国人民书》和马歇尔在国会的证词，“皆表现其侮华之狂态”，自称“不胜为民族自尊心之痛愤”。22日，蒋在日记中再次批评美国外交“幼稚”和司徒雷登“轻浮无知”，并为此愤愤不已。

2月26日，蒋介石接到张群电话，告以上海谣传，蒋介石在庐山被刺，继而谣传，蒋介石辞职，“人心惶惑，物价飞涨，美钞一元已涨至法币30万元”。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游览庐山名胜观音桥，在途中做出决定。蒋于2月29日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

最后半日游观音桥途中，对于本人在国大时为国民党、为革命、为主义之利益与个人之出处已有一具体之决定，引以为慰。

蒋介石做出了怎样的“具体之决定”，日记没有写，但是后来，蒋命人为他编辑《事略稿本》时，就把它补明了。

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以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党内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以为救国之出路。

这段记载将蒋介石推荐胡适参加总统竞选的目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便于处理对美关系，赢取好感，改变美国人的印象，以便在获取美援的过程中少一点阻碍和困难。就在蒋介石在庐山做出决策之前几天，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谈话说：“（中国）对外结合的工作，我固然愿意推荐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显然吗？

从抗战后期起，蒋介石即多方设法，取得美国援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打内战，更形成了对美援的依赖。一方面，蒋介石对美国不满；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争取美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蒋在庐山期间，美国国会虽然通过了援华法案，但是，美国政府却多所借口，只援助经济而不援助军事。1948年2月29日，蒋介石与司徒雷登谈话，谈到美国国会的援助数额虽然不小，但是“最急、最需与最轻易之步机枪子弹则未赠一枚，而且其前此拨援之步机枪子弹亦不能分配十枚之数，此种缓不济急与名援而实阻之不诚举动，殊不知其意之所在。”4月8日，蒋介石曾亲告胡适，推其竞选总统的建议是他在牯岭时“考虑的结果”。为何蒋在牯岭有此考虑呢？其因盖在当时争取美国军事援助中碰到了困难。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21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21日。原文为：“其大使发言之荒谬及其马歇尔在国会之答词”，表述有误，应指司徒雷登的《告中国人民书》及马歇尔在国会的证词。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26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29日。

《事略稿本》，1948年2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234/029。

《司徒大使这样说》，《中央日报》，1948年2月23日，第2版。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29日。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4月8日。

#### 四、蒋介石决定推荐胡适竞选,同时仍在为自己当总统做准备

2月8日,蒋介石夫妇上庐山之前,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抓机会与蒋介石见面,陈述对“戡乱行宪”的意见,涉及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以及国大会议是否修改宪法等问题。蒋介石答称:“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是否有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存。至于宪法与行宪问题,亦只有因应时宜,以革命手段断然处置。”2月10日,张群转告王世杰说:蒋介石自己对“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关于蒋“考虑”的内容,王猜度说:“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至于总统,虽位居“元首”,对外代表国家,但只是“虚位”,对其权力有若干限制。如其第53条规定:总统任免官员须获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签署命令须得到行政院长副署。其第39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第43条规定:国家遇有灾害、防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总统可经行政院会议决议,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等。这样,总统的权力就受到很多限制。这些限制,自然为酷爱集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所不愿、不喜。

3月20日,蒋介石约集陈立夫、陈布雷等人开会,“指示国大代表资格与宪法及授权总统案之方针,分别与各方接谈。”其中的“授权总统案”,结合后来张群、王世杰等在国大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显然其目的在于扩大总统权力。

蒋介石可以推荐胡适竞选,让胡担任“虚位”元首,但绝不会肯于让他担任超越宪法、具有实际巨大权力的总统。蒋介石对陈立夫、陈布雷等人的指示,说明蒋介石并不想真正让出权力,其内心深处,还是准备自己当总统。

#### 五、蒋经国上书蒋介石,建议蒋任行政院长

3月26日,蒋经国上书蒋介石,声称蒋出任总统,已经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但本人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蒋以“谦辞总统,退任行政院长”最为适宜。其理由有三点:第一,“足以表示在共乱未平前,对国家政治之负责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对全国拥戴出任总统之谦让精神”。第三,“可以避免行宪初期五院间之纠纷”。

蒋经国所称第一点理由,信中未作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接连失败,经济恶化,通货膨胀,社会不稳,这些,蒋介石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蒋经国又无法向蒋介石言明,只能笼统地劝其“谦辞总统”,以示“对国家政治之负责精神”。关于第二点,他解释说:“全国民意均一致拥戴,大人出任总统,自难强其不选,但如能于当选后谦辞,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总统,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2月8日。

《王世杰日记》第6册,1948年2月10日,台北,中研院1990年影印版,第173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3月20日。

《蒋经国家书》(4),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40700/00004/008。

固足发扬我国谦让古德,尤可于行宪之前,发生政治教育作用。”蒋经国估计,蒋介石一定会当选,主张在当选后“谦辞”。何以如此呢?

此前各地进行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乌烟瘴气,闹得不可开交。本来,各地不少国民党人为了扩大政治势力,升官发财,都竞相参选;再加上,国民党为了成立“联合政府”,做样子给美国人看,特别给追随自己的青年党、民社党留出若干名额,以示礼让。这就使得有限的代表名额更为紧张,选风因而更为恶劣。1947年11月10日,蒋介石曾在中央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党员不计较个人荣誉地位,免致分散目标,削减力量,除由本党决定列入的参选者外,其他人皆应发扬“多尽革命责任,不争个人权利”的精神,专心致力于本身职务,不参加竞选,以便多留名额,为“友党人士”和“社会贤达”提供参政机会。当时,蒋介石已被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推举为国民大会代表候选人。11日,蒋介石特别发表声明,不拟参加竞选,而将名额留给适宜的奉化地方人士,藉以“树立民主之楷模”。事后,奉化参议会电陈,全县人民“赤诚拥戴,希望蒋介石万勿谦辞,但蒋介石仍然复电辞谢。不过,蒋介石此举并无多大效果,除顾祝同、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汤恩伯等30余亲信响应外,参选竞争仍然愈演愈烈,以致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制定《自愿退让与友党办法》,以示鼓励。蒋经国信中所说“政治教育作用”,显然针对当时国民党内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现象,希望以蒋介石的“谦辞总统”作为救治药方。

蒋经国所称第三点,他解释说:“如能在行宪初期,大人出长行政院,使五院之间有一中心,不独可避免五院间之纠纷,并足为行政、立法之间树一良好基础,永奠国家政治之安定。”孙中山提倡“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互相制衡,蒋介石早就认为:“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蒋经国之所以劝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其意在于使蒋成为“五院”的“中心”,仍收“总统集权制”之效。

蒋介石最初的想法是,如胡适竞选总统成功,他自己出任“参谋总长”,掌握军权;读到蒋经国的信以后,他的想法变为改任“行政院长”,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全部行政权力了。

## 六、蒋介石托王世杰传话,要胡适出来竞选

蒋经国上书之后,蒋介石继续思考“总统、副总统的人选”问题。其3月27日所书《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第8条为:“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第9条为:“胡适任总统之利弊。”说明他仍有某种犹豫。

29日,国民大会开幕。30日,蒋介石约王世杰谈话,坦率说明:在现行宪法之下,自己如担任总统,将会受到很大的束缚,不能发挥能力,戡乱工作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蒋要王向参加大会的胡适传话:本人“极愿退让”,不竞选总统,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自己愿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

胡适听了王世杰的传话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

《蒋经国家书》(4),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40700/00004/00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3331、3332页。

《蒋经国家书》(4),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40700/00004/00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4年6月9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3月27日。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022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3月30日。



他并表示：“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王世杰就此鼓励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当日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实无此勇气。第2天，胡适与王世杰、周鲠生谈了3个小时，仍觉“没有自信心”。当晚8点1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表示“接受”。他要王转告蒋：第一，请蒋考虑更适合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蒋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4月1日晚，胡适往见王世杰，声称“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他说：“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国民党长期实行党治，以党治国，推行一党专政，因此，以国民党党魁担任国家元首是常规，至少，其人也必须是国民党员。现在，拟由无党派人士竞选并担任总统，自然是对于“一党专政”制度的局部修正。胡适之所以肯定蒋介石的建议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其原因亦在此。

3月31日上午，蒋介石继续研究推举胡适为总统的“得失”及其与“国家之利害、革命之成败”的关系，其日记中称在作了“彻底考虑”之后，“乃下决心”。当晚，蒋介石与宋美龄巡视南京下关时，与宋“谈推选与退让之大旨”，向她透露消息。同晚，蒋介石得知胡适接受推选，很高兴，立即召见陈布雷，详述旨意与决心，命陈先行告知戴季陶与吴稚晖二人，不要反对。他说：“此乃党国最大事件，余之决定必多人反对，但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革命亦难成功也。”4月1日，蒋与张群研究，得到张的支持。当日，陈布雷来报：戴季陶主张总统不得退让，“否则国基、民心全盘皆乱”。吴稚晖则赞同蒋的主张。蒋介石感到高兴。当晚与戴季陶谈话1小时多，终于将戴说服。

4月2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等，决定于4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

## 七、蒋介石劝退李宗仁与程潜

继李宗仁之后，孙科、程潜、于右任陆续宣布参选副总统。

孙科原是蒋介石预定的接班人。然而抗战期间，孙科主张亲苏，发表过若干反对独裁的言论，使蒋极为不满，加之孙科贪钱爱色，蒋介石骨子里看不上他。但是，孙科是文人，尚能听话，不像李宗仁、程潜，手头有军队，易于另树一帜，甚至反叛。因此，蒋介石决定劝退李宗仁和程潜。至于于右任，蒋介石不认为会对自己、对孙科形成威胁，没有当回事。

蒋介石决定不参加竞选总统，自然有了劝退李宗仁等人的本钱。4月2日，蒋介石先约白崇禧谈话，宣称“军人不竞选以垂范于后世”，“勿蹈民初之覆辙”，同时告诉白崇禧，自己已决定不参选总统，要白转告李宗仁，勿再竞选副总统为要。4月3日晚，蒋介石又约见李宗仁，劝其停止竞选副总统。这次会见，两人都极不愉快，李明确表示“很难从命”。对此，李宗仁回忆说：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30、31日。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4月1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3月31日、4月1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2日。

接着,李宗仁便说明自己“天时”、“地利”都不利,但“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据记载,蒋介石原来和李宗仁并坐在沙发上,这时满面怒容,一下子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听了李宗仁的话,蒋介石“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

关于这一次见面,蒋介石日记则记载:“彼乃现丑陋之态。始而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语,反党、反政府之词句,几乎一如李济深、冯玉祥之叛徒无异,甚至以国大提名让党非法之罪加之于余之意,及不惜分裂本党相恫吓。余只可怜其神志失常,故不再理解,听之而已。”根据这一段日记,可以发现二人争执的情况要比李宗仁的回忆更为严重。

蒋介石与李宗仁谈话后,继续会进程潜,劝其退出竞选。程潜不肯退出,但蒋介石认为“其态度较佳”。

当晚,蒋介石会见陈布雷、陈立夫、吴铁城等人,得知桂系以“分裂”、“不出席国大”、“推倒国大”相威胁,叹息说:“不惟不择手段,且无廉耻,人之无耻,则不可收拾矣!当夜,蒋介石再次不能入眠。”

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白崇禧,告以昨晚与李宗仁谈话情况,给蒋留下的印象是:“彼甚明理,不以彼等跋扈蛮横为然也。”

## 八、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竞选建议,遭到否决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召开,讨论总统、副总统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声明:此前未就是否参选总统一事加以说明,其原因在于本人是党员,应尊重党的决策,接受党的命令,在党未决定以前,个人不能有所表示。他批评“本党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违反党纪,宣称自己已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候选人。此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1.富有民主精神。2.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3.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4.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5.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这5条几乎是按照胡适的情况量身定做的。蒋介石接着声称:这是他数月以来深思熟虑,基于革命形势所得出的结论。“今日宜以党国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旨。”当日,除吴稚晖、罗家伦两人外,其余出席者都不赞成蒋的意见,邹鲁并提议以“起立”方式表示拥戴“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罗文藻则建议修改《宪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使蒋介石担任总统后,能真正担负“戡乱建国”的责任。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蒋介石再次发言,警告称:全会如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则“剿匪”不能成功,本党且将于2年之内蹈袭民国2年整个失败的悲惨命运。会议仍然无人响应蒋的意见,不得已,会议定将此案于次日移交中常会讨论,做出决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85—886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3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3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3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4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3422—3423页。

定后再向全会报告。

4月5日晨,蒋介石先后约陈布雷、白崇禧、张群等人谈话,商谈总统候选人。蒋特别要张群在中常会上“作最后之奋斗”。陈布雷向蒋说明,推举党外人士竞选,在国民大会中实无把握;张则报告青年党态度,认为必须由蒋担任总统,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意。至此,蒋已不再坚持原意,3人继续研究在不修改宪法的原则下,如何安定政局,推进“戡乱”工作。当日上午10时半,中常会召开部分人员参加的预备会。贺衷寒、袁守谦和与三青团有关系的常委主张接受蒋的意见,但张道藩、谷正纲和与CC系有关系的常委则反对,主张蒋继续做总统。争论激烈。张道藩声泪俱下地表示:“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决服从总裁指示,只有这件事情不能服从。”张群发言称:“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提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选总统候选人的。”会议因而决议,推张群、陈布雷、陈立夫3人于中午向蒋征询意见。

当日中午,蒋介石得悉预备会情况,嘱咐王世杰往见胡适,告以前议作罢。日记云:“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之外,并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

同日下午3时,孙科主持召开中常会谈话会,出席55人,列席23人。会议决定提出一份《研究报告书》,认为蒋的意见既发扬孙中山“天下为公精神,为行宪伊始,立选贤与能之良好规范”,又体现“对戡乱建国积极负责,不计名位,为国家作实际有效之服务”的品格,但是,鉴于当前国事艰巨以及党内外殷切期望,“在事实上,非总裁躬膺重任,不足以奠立宪政基础”,因此,仍然推荐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会议并决定,推王宠惠、孙科、居正、李文范、陈布雷、张知本、张群、王世杰等8人负责研拟“如何在不修改宪法条文之原则下,使总统得切实负荷戡平共匪叛乱、巩固国家基础之责任,使剿匪与动员事项得以适应事宜”。会后,王世杰等即负责起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便给与蒋介石以“紧急应变的特殊权限”。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向六届临时中央全会提出《研究报告书》,会议决定,拥蒋参加竞选,但党不提名,由国民党党员中的国大代表依法联署提名。同日,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其后,吴稚晖、于右任、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王云五等100余人发起,共1489人联署,推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8日,蒋介石邀胡适吃晚饭,再次致歉。他告诉胡适:“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对蒋称:“党的高级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介石一再要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答以“我不配组党”,建议蒋将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此会无名称,居正称之为“小组会议”,见《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7—198页。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5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3424页。

《陈布雷呈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谈话会委员发言归纳整理》,转引自刘维开《中国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研究》,《1940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关于此次会议,程思远回忆称:“陈布雷向会议汇报称:如果能提出一套补救办法,则总裁仍愿出任总统候选人。王宠惠当即提出,避开宪法的有关规定,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的紧急处分权力。他并比喻说:“我们有了一座大房子,还要一间小房子。宪法是大房子,临时条款是小房子,两间房子互相为用。陈布雷随即提出一份“决议文”,宣称根据“国家当前的形势,正迫切需要总统的继续领导”,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81页。

《王世杰日记》第6册,1948年8月15日,第178页。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4月8日。

关于国民党高层反对蒋介石建议的情况,司徒雷登于4月6日向马歇尔汇报说:“国民党对于这种建议的反映,是非常沮丧的情绪。虽然在新宪法之下,总统权力大大减少,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建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也使国家需要有一个有力的舵手。在一系列的会议之后,CC派拒绝与任何非由蒋委员长担任总统来领导的政府合作。黄埔系威胁宁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服务于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总统之下。国民党领袖联合提出蒋委员长是担任总统一职的不可或缺的人。因之,蒋委员长屈服于国民党的命令,他今天同意参加总统竞选。”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自然不甘心对政权的控制作任何一点放松。

国民大会开幕前夕,乱象愈增。有部分奉命“礼让”的国民党当选代表不愿“礼让”,宣言“绝食护宪”,住进会堂,企图阻挠第2天开会,一直坚持到凌晨4点,被蒋介石命警察强行拖出。其中有人又抬出棺材,誓言以死抗争。蒋介石于3月30日接见这部分代表,软硬兼施,才算平息。此后,这批人并曾计划捣毁会场,阻碍议事,闹剧不断。与此同时,民社党、青年党的代表名额虽然得到国民党的“礼让”,但仍不满足,多方责难;几个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互不相让。蒋介石曾经感叹:这些人“宁毁党国,而不肯放弃丝毫之权利”。

4月4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按我们的宪法,总统制、内阁制两不健全,无论何人作行政院院长,亦非钧座主持不可,但钧座若以总统之地位主持,势必遭受破坏责任内阁之责备。山意钧座将大总统一席选一元老,钧座亲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宣示国人,破釜沉舟,号召天下爱国者来与匪决战。”阎锡山的这通电报道出了蒋介石的内心症结。4月6日,蒋介石复电称:“至理名言,先获我心,感佩何似!国大召集以来,弟已一本如兄所言,积极策进,无如环境与事业终不许可,今将成为梦想矣。本党党员既不能遵守纪律,又不能信奉政策,言念前途,不寒而栗。”14日,蒋经国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蒋仍“以不出任大总统为上策”。函称:“此事不但针对目前之处境应采取此项决策,即以大人今后在我国历史上之地位而论,亦以谦让总统为是。”不过,蒋介石的参选此时已成定局,蒋经国此函不会发生什么作用了。

## 九、蒋介石费尽心力,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蒋介石对扩大总统权力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极为重视。4月9日,蒋介石亲自找民社党领袖张君勱谈话,要他支持临时条款。张犹豫不决,蒋即答应给民社党以经济协助。12日、14日,蒋介石先后召集有关人员和出席国民大会的国民党党团干部讨论、协调。16日,国民大会召开临时条款审查会,讨论终日,青年党强烈反对,迫使蒋介石两次召见该党党魁曾琦,“好言婉劝,百端忍受”,一直谈到深夜10时,才得到曾琦的“半诺”。蒋介石长期习惯于一呼百应,何曾受过此等窝囊气,日记云:“困迫如此,殊非预料所及,灰心极矣!”17日,蒋介石首先召集出席会议的党员代表两千人开会,“予以训示”,使党员代表通过临时条款。接着,蒋介石又因临时条款关涉宪法,到大会宪法组视察,发现那里正为此“喧哗不休,几乎动手互殴”。蒋的出场具有震慑作用,临时条款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59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8、12日。

《阎锡山致蒋介石》,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20400/00010/08。

《蒋介石复阎锡山》,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20400/00010/084。

《蒋经国家书》(4),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40700/00004/010。

得以通过。散会时,蒋介石气极,以“人民”资格将宪法组的代表们“训戒”了一通。

4月18日,国民大会公告,以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同日,国民大会开会,讨论莫德惠等1202人提议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时,可以“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的限制。这样,总统的权力不是缩小,而是前所未有地扩大,可以不受宪法的限制。讨论时,田植萍批评此项条款的审查,“无守法精神”,“无民主精神”。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情绪之紧张已达极点,幸事前布置,反对最烈者或以余在座,皆略申其意,未作激辩,卒至12时1刻,三读会通过,国大最大功用已经完成矣!”当日到会代表2045人,赞成者1624人,可见,有大量代表反对。

19日,蒋介石在出席代表2734人中以2430票当选总统,居正因蒋事先作了安排,得269票,没有全失体面。20日,国民大会公告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为副总统候选人。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更为激烈,致使国民大会开得更加乌烟瘴气。有关情况,当另文研究。

总统选举的尘埃落定,蒋在日记中却多次表示,未能实现初衷,以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又未能由党来公决副总统候选人,是“最大之失策”。据其5月15日日记载:当日晨醒后,他曾考虑是否就职,或让位于李宗仁,自己仍退任行政院长。思考再三,决定退让,但起床后向“天父”祷告,“天父”默示“进”,蒋介石遂决定不辞。

## 十、司徒雷登的评价与失望

蒋介石推出胡适竞选总统,本意之一在于做给美国人看。4月2日,傅泾波来见蒋介石,据称马歇尔致司徒雷登大使手书有“今日方知蒋主席人格之伟大”之语。《纽约时报》、《前锋论坛报》也都给予好评。然而,司徒雷登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门道。4月6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认为这是蒋的“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其后果是“确定了他的总统的地位,获得了国民党内对他的领导的拥护,扩大了他的权威”。

司徒雷登认为,国民党内存在派系,对蒋的领导能力的不满日益增加,蒋担心党内分子利用国民大会攻击他的政策,以至促成党的分裂,因此表示退出竞选,建议国民党支持非国民党的竞选人,结果反而促成国民党人对他竞选总统的普遍拥戴,从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这些原来准备批评他的人,“将来还可能不过分吹毛求疵地接受他的政策”。司徒雷登的这一估计有一定道理。由于蒋介石以退为进,国民大会上本来应该出现的对蒋介石的尖锐批评都消声失音,代之以非蒋出任总统不可的喧闹与鼓噪。4月10日,有河南代表对蒋介石所作政治报告提了点不疼不痒的批评,认为“不够详尽,不能满意”,结果,全场哗然,引来大量“痛愤不平”的攻击。

司徒雷登的其他估计则未免过于乐观,例如,认为蒋介石此举将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被迫从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9、16、17日。

《各代表意见》,《中央日报》,1948年4月19日,第2版。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18日。

《国民大会三读通过》,《中央日报》,1948年4月19日,第2版。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5月8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2日。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59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60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4月10日。

“独夫统治”、“蒋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可以答复国内外的其他批评者，蒋正在努力扩大“新政府的基础”，甚至说：蒋介石此举的动机“无疑地是由于需要国民党内的更加团结”，等等。然而在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司徒雷登立即看出了这一条款将“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4月23日，在蒋介石被选举为总统之后的第4天，他向马歇尔报告说：

他坚持着一种摧毁他自己的目的的政策。我相信他不是为了自私的动机而求独裁的政权，但坚持这样做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在他领导之下，事情越是恶化，他越是感到必须负起整个的重担。

不管蒋介石怎样企图为国民党政权装点民主的花饰，然而，司徒雷登还是很容易地看出，蒋介石所追求的是扩大权力，国民党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进一步走向独裁。5月6日，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日记云：“态度不良。”显然，司徒雷登正在不断增加对蒋介石的失望与绝望。

还在抗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就曾在开罗会议晤见蒋介石时明确地讲，当时的中国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发展为具有两重性的政策，即一面扶蒋反共，一面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实行的一党专政制度及其腐败与无能，要求国民党改革自己的统治方式。杜鲁门就任总统后也曾于1945年12月15日发表声明：“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1948年3月11日，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临近，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自由分子将被容纳到政府里去”。与此相应，蒋介石的对美政策也具有两重性，即一面对美国政府的侵华企图及其霸道有不满，有警惕，但又不能不依赖美援以维持统治。这样，他就不能不在某些方面应付和敷衍美国人，在政治改革上做出若干让步。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接受马歇尔调停；改组国民政府，延揽非党人士出任国府委员；不惜低声下气，乞求民社党、青年党等参加国民大会和政府机构等。他之所以推荐无党派的名流胡适参加竞选总统，也是这种让步之一。无奈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痼疾已深，不受到刻骨铭心的沉痛打击，难以做出真正的、有实质意义的改变。

附记：此文修订过程中，承台北政治大学刘维开教授帮助，谨致谢意。

作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杨宏)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60、861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5月6日。

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155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9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16页。

这个问题较复杂，须另文讨论。兹举一例：1948年年初，蒋介石准备派俞大维赴美争取援助。俞大维行前，与美国公使衔秘书克拉克谈话，克称：俞赴美，只能以远东司司长为谈判对手，马歇尔不能接待。克并要求中国开辟南京与汉口为商埠作为援华条件。蒋介石得悉后，很生气，决定俞停止赴美，同时向“天父”祷告、请示，可否对美表示绝交。连问三次，“天父”均示以不可。他在1月6日的日记中感叹：“照常理决策，以为对顽固不灵之政敌，有词可藉，有机可乘，非予以当头一棒，使之有所觉悟不可，而神则再三示为不可。过后半日，乃发现余自主观太强，思虑错误处。”

#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2, 2011

## **Chiang Kai-shek's Proposal that Hu Shi Run for President: An Explanatory Reading of Chiang Kai-shek's Diary** ..... Yang Tianshi (4)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mulated in 1946 adopted a cabinet system, and real power was controll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hough the president was the head of state, he just had a "nominal position." Chiang Kai-shek had no interest in a "nominal position," and for a time he planned to quit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d recommend that Hu Shi run for president. He wanted to take the positions of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or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reby change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and win favo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it easier to gain American aid. Chiang's proposal was widely opposed by high officials of the Guomindang. They expanded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by revising and enlarging the *Temporary Provisions Effec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munist Rebellion*, and Chiang Kai-shek then accepted nomination and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ct ran counter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 expectations, and the Guomindang regime continued to be seen as a "dictatorial regime." John Leighton Stuart criticized Chiang Kai-shek, saying that he "not only harmed himself, but also harmed the country."

## **How Great the Differences Are—Chiang Kai-shek and Hu Shi's Notes about Their Contacts during the Taiwan Period** ..... Chen Hongmin, Duan Zhifeng (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Hu Shi ha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has even been given myriad symbolic meanings. Their relationship after the Guomindang regime fled to Taiwan in 1949 both continued their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mainland period, and also acquired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aiwan's environment. The release of Chiang Kai-shek's Taiwan-period diary has provided brand-new data for studying their relationship. Both Chiang Kai-shek and Hu Shi's diaries noted their contacts and their observations of each other, but the notes are very different, and we frequently encounter examples of "one incident with different narratives." The vivid contrast between Chiang Kai-shek's severe scolding of Hu Shi in his diary and his "courteous treatment" of Hu Shi in public lead us to ponder the wheels within wheels that lie undemeath.

## **A Study of the Reform of the County-level Judiciary Personnel System in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eriod** ..... Wu Yan (34)

Duri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period, the supreme judiciary authorities tried to reform the county-level judiciary personnel system,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county-level courts thereb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ichuan Supreme Court, all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 carried out the reforms. The new system took following measures in regard to the appointment of personnel: raising qualifications for posts, adopting new standards evaluate existing personnel, adopting the use of examinations to evaluate candidates, training personnel who fail to reach set standards, and building a set of normative examination method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ffort some of the reform's goals were realized, but the results were not wholly satisfactory. Many factors hindered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s. For example, the reform plans were not geared to actual circumstances; there were not enough judiciary personnel availabl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ersonnel were not properly handled. These factors repeatedly delay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unty-level courts and judiciary departments. In addition, inter-departmental conflicts and power struggles over personnel managing also slowed down implementation. Though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regular inspections and a normative system for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s' lack of cooperation reduced such supervision to a mere formality.

## **Modern De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arket Networks—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Modern Fur and Textile Trade between Southern Hebei Province and Northwest China**

..... Wang Xiang (49)

The longstanding trade of Southern Hebei textiles for furs from Northwest China provides a valuable case study for u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ket networks and their continuation and deformation in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market networks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a long time the Southern Hebei region centered around Xingtai and Handan exchanged native homespun cloth for